

第一部分

文本的辨认

- 一、文本中的人性图景
- 二、域外经典的启示
- 三、融通的文学理论



痛苦的寓言

我是在那些少男少女一双双明亮而洋溢着热情的眸子里，真正读懂拉甫列涅夫的具有世界影响的著名小说《第四十一》的。说句实在话，当我把以斑驳破损的旧书为蓝本而复制出来的一厚叠《第四十一》，发给这些年轻的中文系大学生去阅读和讨论的时候，心里荡漾着的是一种微微含有隐痛的历史感。据老教师们说，这本旧书已被复制过好几回了，第一次是猛烈的大批判；第二次是稍稍的认可，但认为放在如此尖锐的场合来描写，有人性论的过失；第三次又是第一次的重演，甚至认为作家是右倾分子。前不久，有人念起译者曹靖华在“译后记”中的语言，说道：恋爱也要服从革命的需要，这是不是有点儿太“左”了呢？

但是为什么我们（特别我自己也如此）总是喜欢讨论这部作品，为什么每一届学生总会引起持久的讨论兴趣与热情呢？那天讨论会上，我从争先恐后的发言中终于发现：这里有一个关于人类的动人的母题，或者说，这是一个以现代的形式、古老的故事而编织起来的痛苦的寓言。

战争。为什么要把关于人类母题的故事放在战争的环境中呢？立刻就有人回答说：战争往往以它的迅疾使得人们在慌乱之中丢弃一切掩饰的负荷，而只留下粗线条的爱和恨。但作家的高

明就在于，他适时地淡化了战争的过程，让因战争造成的后果成为偶然遇上的陆地。刹那间，世界只剩下孤岛，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如同上帝创造的新世界一样单纯、新鲜。

“他俩除了爱，别无选择。”一位女学生的叹息，仿佛道出了所有其他人的内心体验。是的，在这种单纯、自然和生命力面前还可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两位男女主人公谈论诗，谈论未来，彼此互相欣赏着。他们也争吵，但只要世界永远如此平静，海水永远如此清澈，这些争吵总会像退去的波浪那样，走了，消失了。我惊奇地（回过头来想想也是顺理成章的）发现，女学生们比女主人公玛柳特迦更羡慕男主人公——近卫军中尉的风姿与人情味。她们喋喋不休地引述着以下这些句子，以说明中尉对玛柳特迦的吸引是很自然的：

“十个人颠簸地、被风吹得摇摇晃晃地走着。一个人笔挺地、沉着地走着。这就是近卫军中尉郭鲁奥特罗。”

“在玛柳特迦的心灵里对于中尉，对他那细细的双手，对他那温和的声音，尤其是对他那付非常蓝的眼睛，发生了温柔的情爱。由于他这付眼睛，由于他这付蓝眼睛，人生都光辉起来了。”……

然而，学生们还是冷静与清醒的，不少人宣布，他们看出了小岛确是他俩爱情的温床，但小岛的边缘也就是爱情的终点线。我在想，为什么我们都为这道终点线而觉得莫大的遗憾呢？无论是玛柳特迦还是中尉，他们各自经历过或者将来还会经历这暴风雨般的激情么？一生中是不是就这一次？虽然谁也没有说出声来，但大家的内心却是惊人地默契：这是一定的。

小岛外的干扰（船的到来）结束了他们的挚情和浪漫，现实提醒他们两人：必须作出选择，否则就没有生路。中尉选择了逃亡，玛柳特迦选择了鸣枪。后者的选择中断了前者的选择，使永恒的母题笼罩上了血腥的污点。

我说：假如不开枪，生命也许都会延续，但将以何种方式延

续呢？

学生说：假如没有碰上海难，假如飘到岛上的不是两个，假如船上是玛柳特迦方面的人，假如……

可以不停地“假如”下去，但这个故事毕竟圈上了句号，只有这样，它才成为一个意味深长的寓言，一个讨论不完的话题。

玛柳特迦有没有在开枪之后被自我的英雄主义所感染我们不得而知，但她马上开始了一种忧郁的悲咽则是事实。她将为自己的行为而一辈子走不出内心的阴影，这一点每个读者都体察到了。

如果说古希腊的神话是人类童年期的寓言，它是澄明的所在，那么《第四十一》则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它是交织着美与丑、善与恶、真与假的今天的寓言，它是异化的果子。

玛柳特迦的一枪具有象征的意味，它把古代和现代划分开来了，同时又启示我们：放下枪的那一天，全人类将重新回到更高层次上的澄明，到那时候，中尉和玛柳特迦的选择只有一个：相爱，并且直到永远。

“寓言就当它寓言吧，”我对学生们说，“你们看，作家本人在每一章开始之前的简短说明里总是闪闪烁烁地暗示我们，要从情节中走开，要有间离意识。再说那木刻的插图多么富有魅力，令人想到了广阔的人生。”

“寓言的意义是恒定的么？”一位小伙子抬起了头颅，“这样，我们将注定生活在短暂的幸福和永久的沉重之中了？”

我对之无可奉告……

“偶然性”与人的命运

听了您的关于《项链》的公开课后,我感想颇多。您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我是很赞赏的。但是,您对小说主题的分析,我的看法却十分矛盾。是的,您的分析与以教学参考书为代表的主流话语是一致的:从学生们的表情看,他们在您的引导下,似乎也已经接受了您的观点。然而在仔仔细细地反复阅读“文本”以后,我不得不认为,那个对您的主题概括起到重大作用的小说主人公路瓦栽夫人,其实是一个完全被误解了的形象。

长期以来,这种误解在我国流传甚广,今天该是来好好谈一谈的时候了。《项链》是法国小说家莫泊桑的名篇。由于这篇小说一直被收入各种教材,所以在中国,路瓦栽夫人几乎家喻户晓。就艺术而言,这篇小说无愧于名家名篇,这是有公论的,问题在于对小说主题的认识。我们的许多评论文章和教材分析几乎都一致认为:小说通过一个小职员妻子路瓦栽夫人借项链、丢项链、赔项链的遭遇,塑造了路瓦栽夫人这个“爱慕虚荣、追求享乐”的典型形象,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对人的腐蚀和毒害,有力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金钱至上的本质。而您,也是同意这种看法的。

这也就是说,路瓦栽夫人基本上是个反面人物,读者可以从她的所作所为中吸取教训,不再犯类似的错误。那么,莫泊桑所要说的

的果真就是这个故事吗？我读了又读，说实话，如果不戴有“先验论”的眼镜，而是怀着一种新鲜的情绪去阅读这部作品，我们恐怕会读出完全不同的印象和启迪。

不错，造成路瓦栽夫人悲剧的原因确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因素，一个是个人因素。但我们倘若把小说理解成是作者对当时（1884 年左右）法国社会风气的一种针砭，那我们又怎样理解一百多年来它会长盛不衰，始终受到读者青睐？

小说一开始就用细腻的笔触写出了路瓦栽夫人的内心痛苦：现实与梦想的矛盾。作品写道：路瓦栽夫人出生微寒，“没有陪嫁的资产”，只得跟教育部一个小书记员结了婚，过着贫困的生活、“不能够讲究打扮，只好穿得朴朴素素”。这使她“不断地感到痛苦”。实际的境况是“住宅的寒碜，墙壁的暗淡，家具的破旧，衣料的粗陋”，而梦想的呢？却是“幽静的厅堂”、“宽敞的客厅”、“华美的香气扑鼻的小客室”和各种奢华的装饰、精美的佳肴。她“什么也没有”、“然而她偏偏只喜爱这些”。路瓦栽夫人的“过错”，就个人方面而言，或许就是意识到了自己的美貌，以及这种美貌的价值与置身环境的恶劣的反差。然而，我们难道可以因此而下判断：路瓦栽夫人就该“维持现状”，永远也不能有“非分之想”吗？

由于路瓦栽夫人特别的“美丽动人”，所以她对这种反差的感受就特别强烈、梦想也就特别高远，这有什么不可理解呢？那些梦想与现实一致的贵妇人，当然不会为了这些“希望”的念头而癫狂，她们在物欲得到满足以后，会生出种种精神上的新“奢求”，这并不比路瓦栽夫人高尚多少。

小说后来神形毕肖的描写，使人们看到一个活生生的、陶醉于自我价值暂时得到满足的女人怎样一下子滑到了沮丧、失望的心灵低谷。这里的外部与内部描写，这里的细节刻画，似乎都显示了路瓦栽夫人始终是爱慕“虚荣”的。如果将达不到某种目的，而又想尽快或暂时达到这种目的诠释为“虚荣”，那么路瓦栽夫人的确

是爱“虚荣”的。可是,这种许许多多处于相仿境地的人(包括我们)都会具有的心态,我不认为就是作品所要揭示的题旨。

如果我们将注意中心放到小说的后面部分,也就是丢失项链后,路瓦栽夫人是如何面对这个事实的,我们就会看到她身上闪光的品质:夫妇俩决定买一根新的项链归还朋友。从此,为了偿还债务,他们整整艰难困苦地挣扎了十年。为了节省每一个铜子,路瓦栽夫人穿穷苦女人的衣服、干穷苦女人的家务;路瓦栽先生则“常常到了深夜还在抄写五个铜子一页的书稿。最后,他们终于还清了这笔巨额债务。这是一种多么诚实的品格!毫不作假,也不去乞求别人的施舍,这是多么难得的境界!如果说资本主义毒化了她的灵魂,那么路瓦栽夫人这种诚实的品格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小说中具有诚实品性的不仅仅是路瓦栽夫人,她的丈夫,甚至借她项链的佛来思节夫人(她感动万分地承认自己的项链是假的),也都极其诚实。照此分析,传统的说法就难以自圆其说了。

这里,我想谈谈自己对这篇作品主题的不成熟的看法,请您指教。我以为,这篇小说的主题在于:揭示了“偶然性”对改变人的命运的巨大作用。在小说中,路瓦栽夫人先前只是感叹已不如人,但她并没有改变现状的实际行动,而只是沉溺于幻想之中。可是,一件意想不到的偶然事件(失链),改变了她整个人生:她迫于“债务”,终于行动起来。辛苦十年,赢来数万法郎。想想看,要不是还债,她不是可以大大改善自己的生活了吗?所谓“爱慕虚荣”与“失链”其实本无必然联系,而“失链”与由此引起的“十年辛苦”及整个人生观的改变却是一脉相承的。

偶然的事件,使一个好幻想的人终于走向了现实。这,就是《项链》给我的启迪。

这样的分析也许与原有的思路完全不同,但我觉得,它似乎更符合实际。说得远一点,对于许多名家名篇,只要我们摆脱陈规习见,就会有新的发现和新的感悟。您说呢?

隽永的佛图

读叶绍钧(圣陶)的散文《两法师》，全然不如读那有头有尾的故事，而恰似在观览一幅隽永、传神的佛图。这里洋溢着的不是肃穆的义理，这里飘传着的纯是自然之气，兼或夹杂着一股淡淡的神秘意味。

全文以一次会面作为框架，极细腻地描绘了弘一法师的举手投足、音容笑貌；作者那极有分寸感的议论不时与充满情义的描绘相映衬，现象的意蕴迅速得到了提升。在作者的笔下，弘一法师的整个人格形象可以用一个“静”字来概括。你看，第一次互相见面，便不言语，只是自顾自数着手中的念珠。即便后来有人先开口问了，弘一法师也只是极简单地回答一个短语，便不再多言。就餐之间，有人请教他关于人生的意见，他却虔敬而等于不答地说：“惭愧，没有研究，不能说什么。”在印光法师身旁，他更是只有恭敬的恳求而无一句言语。然而这又决非冷漠和孤傲——倘若真是这样，断不会如此感动作者与激动读者了。弘一法师于宁静之中还被一轮温暖的光环包绕着——他的回答虽然简短，却是“殷勤极了，有如倾诉整个的心愿”；他凭心灵的感悟便知道别人的愿欲；他只穿一双布缕缠成的行脚鞋，就能步履轻捷地赛过青年人；他以赤诚的心地把一切企图与之交往的未出家的朋友们称作“居士”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弘一法师的宁静是与温暖的情致交织在一起的。因为超脱了，因为近乎迷狂了，他才能自然地宁静下来，而不再去比附、探究；因为他有着追求的充实心绪、有着感化众人的意念，故他能散发出温暖的热量，而不去做一尊活的但冰冷的菩萨。宁静之美是一种难言之美。

从这层意义上讲，印光法师的善言和庄重与之形成了对比，正如作者所言：“一个水样的秀美，飘逸，而一个是山样的浑朴、凝重。”这篇散文虽然题名为《两法师》，但很显然的是：弘一法师才是真正的主角，是这位通常所谓带着仙气的和尚，才使得作者将“永远怀念”了。

完了么？不！最使人感到隽永的，还是那隐埋在文章背后的令人永难捉摸的神秘意味。文章一开头，作者就点明：弘一法师就是李叔同，民国初年他还是一家报纸艺术副刊的主编，于书画篆刻都颇擅长，可几年以后忽然出了家，到底为的什么原因呢？作者这里没有直说，而只是婉转地以主观揣度的口吻写道：“是深深尝了世间味，探了艺术之宫的，却回过来过那种通常以为枯寂的持律念佛的生活，他的态度应是怎样，他的言语应是怎样，实在难以悬揣。“这里的”深深尝了世间味“几个分量极重的字眼，与弘一法师目下的超脱神情显然是鲜明的比照。是的”，“他一心持律，一心念佛，再没有站到外面去的余裕，哪里能有研究呢？”是的，生活在某一境界中的人“境界又岂是说得出的”？但是要有今天的执迷，需有当年多大的毅力！他先前一定是有过比较、有过研究的，一旦认定，便永远跳入了佛海，再也不回头了。于是，他似乎“草原上一株小树，毫不愧怍地欣欣向荣”，他完全与自然融会成一体了。他永远是一个谜，一个不要去索解才更有意蕴的悲伤抑或幸福的谜……

叶绍钧真是名副其实的大手笔，这篇《两法师》不仅讲究布局，语言质朴准确，而且毫无雕琢加工之嫌。像他其他的散文一

样，全篇充满了情趣，而这情趣在此地就表现为弥漫着的佛意。这浓重的氛围之被创造出来，除了作者深厚的文化功底，与作者“欢喜四处看望”的观察习惯也分不开。正因为他把一切与之有关的场景、语言、容颜都狠狠地、深深地、细细地记在了心里，所以兴笔所致，就都真实、妥帖、细腻。文末那条附注也于自然中渲染了佛意。读《两法师》着实像在欣赏一幅佛教的壁画，它是有色彩的。

纯粹的自然与心的自然

读完郑振铎的《蝉与纺织娘》，倘若你再找来法国科学家法布尔的《昆虫记》。看一看里边的那篇《蝉》，那么你一定不会产生莫大的兴趣，发现存在于这二者之间的微妙的差异。

的确，《蝉与纺织娘》不同于郑振铎的另外一些散文，这里没有激越的基调，没有愤怒的抗议，只是记载了自己对大自然中虫鸣之声的细致观察和自己的一次独特的经验。从这点看，与法布尔的《蝉》实在没有什么区别。

《蝉》的开头是这样的：

“我有很好的环境可以研究蝉的习性。一到七月初，蝉就占据了家门前的树。我是屋里的主人，它却是门外的统治者。有了它的统治，无论怎样总是不很安静的。”

在极精确、生动地描写了蝉的习性和生长史以后，法布尔这样结尾：

“四年黑暗中的苦工，一个月阳光下的享乐，这就是蝉的生活。我们不应当讨厌它那喧嚣的歌声，因为它掘土四年，现在才能够穿起漂亮的衣服，长起可与飞鸟匹敌的翅膀，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什么样的钹声能响亮到足以歌颂它那得来不易的刹那欢愉呢？”

但是你再读几遍就会发现法布尔的语言于生动有趣之外，更

在乎精确、细密。他记录了蝉孔的口径,他描绘了蝉的幼虫蜕皮的全过程,他探究着蝉在地下生活的秘密。而郑振铎的语言于淡朴清新以外,更注重主体的内在情绪,宛如一首抒情诗。那时常出现的排比句与博喻荡漾着深深的历史感,或充满生机,或徘徊着淡淡的哀愁。“洞箫”,“红楼重幔”,“秋风落叶”,“怨妇”,“琵琶”,“荧荧油灯”与“迎风而唱”,“生之歌”,“生之盛年之歌”,“结婚歌”形成了鲜明的两极。

法布尔对蝉的习性的记录有根有据,给人一种实实在在的感觉;郑振铎在文中记录的那次独特经历——听到了纺织娘的歌声之后再听到蝉之夏曲——则让人回味无穷:兴许这确是自然界的一次偶然事件,兴许这只是作者的一次主观失误?但追究它的可靠性又显得毫无必要。因为从根本上说,《蝉》的对象是自然,是纯粹的自然;《蝉与纺织娘》的对象是“人化自然”,是心的自然。

这是如此地有意味,我们可以想见法布尔是怎样蹲在地上用放大镜仔细观察自然而洋洋自得;而郑振铎则是躺在沙发上,喷着烟云,用心灵的眼睛去看,用心灵的耳朵去听,并怡然自得地陶醉于其中。所以,这就叫一为科学家,一为文学家;一为科学小品,一为散文。

这究竟是民族的不同呢,还是个人好恶的差异,我们说不清楚。法布尔认为有了蝉声总是不得安宁,只是在细叙了蝉的生命之艰难以后才颂扬起蝉来。而郑振铎则能在蝉声中安然入睡,并获致一种清凉的感受。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法布尔的注意力始终在蝉身上,而郑振铎的最终目标则在转移视线,要让对蝉声高旷之音的赞美、对独特经验的诗意描述,引领出一种精神,一种只属于人的、蓬勃旺盛的、生生不息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郑振铎“为人生”的创作主张又一次得到了曝光。

琳达的处境

有人说美籍华人女作家於梨华的小说创作面临着一个题材的危机。的确,她的许多小说,譬如长篇《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短篇《移情》和《雪地上的星星》等一批有名的作品,都是以留学生的生活为创作题材的。要突破这个题材域并非一件易事,这意味着作家要走出自己已经熟悉的圈子,去重新投入一个新的生活天地。然而,我们从另一面也可以看到,正因为於梨华把兴趣和热情都放在了留学生文学这个领地,所以她笔下的故事、人物、场景和情感就显得分外生动感人,她笔下的留学生生活便格外自如、真切、传神。这恰恰又是她的优点。因此有评论家称於梨华为一个阶段上留学生文学的代表。

短篇小说《小琳达》是一篇出色的留学生文学作品,它既有於梨华其他类似作品的共性,更有自己异常突出的个性:它将留学生文学的视界由华人圈子引申出去,不像别的作品那样把异邦的文化和生活环境仅仅作为华人留学生的生活背景,而是让血脉里流着华人血液、脑子里装着华夏文化,而同时又对西方文明充满憧憬的燕心(留学生)与头发自然蜷曲、眼瞳棕黑色的美国儿童琳达及其母亲李兹太太,同时作为作品的主人公。这样一来,一个既真实可信又必然充满戏剧性的场景便设置好了。在这个富有立体感的

戏剧场景中,作家可以导演出多少有声有色的活剧啊!

燕心是带着眼泪逐步逼近这个美国家庭的腹地的。她乍到美国的时候,最为紧迫的问题便是钱。当她很容易地就找到了一份家庭保姆的工作时,她还很庆幸。她带着陌生而好奇的眼光打量着、幻想着美国的文明与美国的家庭,企图为自己找到一条通向成功的道路。但她很快就发现,这是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布佛利山区有着一一种华贵的气氛,“房子不但整洁,而且建筑精巧。每座房子前面是绿茵一片,修剪得一丝不乱,晚樱花娇弱地垂着头。”特别是李兹太太的家,更是雅致、豪华得可以。但是在高贵和表面宁静的背后,却生活着两个燕心所完全陌生的人物。她们是纯然的美国人,她们的待人接物与处世方式同燕心的单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分析一下三个人物关系的演进是极有趣的。

李兹太太雇用燕心这一行为,构成了颇为复杂的一幅人际关系图:首先,李兹太太想藉以获得生活上、情感上的更大自由,而燕心则想以此得到金钱上的报酬,这也是一种自由。而把她们两人联结起来的,却是另一个人:琳达。小琳达是个必不可缺的人物,她像一条纽带把自己的两端交给了两个各怀心事的女人,这就形成了她与两个不同女人之间的不同关系。小琳达是整个故事的主角,以她为中心,组成了层次分明的三组人物关系式:

1. 小琳达与燕心的关系;
2. 燕心与李兹太太的关系;
3. 李兹太太与小琳达的关系。

其中李兹太太与小琳达的关系是比较简单的母女关系,这是一种血缘联系。但是李兹太太又是个现代气十足的妇女,她不愿意为了孩子而浪费自己的年华,她毕竟才三十多岁!除了满足女儿物质的需求以外,她很少会去思索女儿性格形成的原因和女儿精神上所企盼的慰藉。可是作为一个美国社会的现代妇女,李兹太太显然也有自己的隐痛:“微带倦怠的脸,黑瞳子的眼虽已失去

了少女的绚烂的光芒,却含有一种若有若失的轻怨。”小说中,这对母女的关系没有什么起伏变化,是比较典型的西方式的家庭关系。但燕心与李兹太太的关系就不同了。一个是留学生,是被雇用的;一个是当地的有钱人,是雇主。更重要的差异在于:一个是东方人,一个是西方人,彼此有着明显的文化裂沟。只是这种不同的身份和文化差异在双方各自寻求“自由”的过程中被忽略不计了,她们两人可以各干各的,虽在同一个屋顶底下,却互不干扰。不幸的是,这里除了“不同”以外还有一个致命的“相同”点,那就是:她俩都是年轻的女人。在小琳达一番带着夸张和恶作剧的描述以后,这种不幸便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尽管它被掩饰在貌似彬彬有礼的言辞之后。李兹太太不想失去得到的爱情,这是女人的妒忌,也是现代西方人的悲哀。

小说中写得最有声有色的,是小琳达与燕心的关系。燕心主要是从琳达身上逐渐认识美国家庭的。小说一开始便点出了存在于小琳达身上的矛盾:她短裙下圆而肥的小腿和她有小涡的手都证明她是一个“健康”的孩子;可是她娇嫩的面容没有晴朗的笑意,她俏皮的小嘴没有孩童的痴憨,她整个的形态给人一种“不健康”的印象。随着接触的增多,这种“不健康”的感觉对燕心来说是愈加剧烈了。小琳达狡黠、刻薄,说话很不留情,如果不依顺她,她还会造谣生事,有时甚至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不过,倘若仅仅用这些话去概括琳达,那还算不上是精确的。她的这种行为并非老谋深算之举,有时候也根本没有意识到这言语会带来的后果。她在乖张任性以后,也会有“伤心的泪水”,也会有“一脸企盼的表情”,有时还会自动勾着燕心的脖子,请求燕心永远不要离开。造成琳达这古怪性格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李兹太太似乎不屑于去想,可燕心却在逐渐加深接触之中理悟了:小琳达的父亲死了,母亲的有等于无,这怎么会不严重影响到孩子的情绪与性格呢?西方文明传染给小琳达的东西,自然不会等同于自己弟妹在传统

文化中所受到的影响,所以他们是完全不同的。

小说刻画琳达的性格有时候是正面描绘、淋漓尽致;有时候是侧面衬托、含蓄暗示。譬如琳达对玛丽的依恋,说明了琳达自有她的真情在,可惜的是玛丽又要走了。再譬如,小说写道:家中无人的时候,琳达常被寄放在邻居家。我们并不知晓琳达在那儿的情况,但我们可以想象出琳达的孤寂与可能受到的种种刺激,小小的琳达有她自己的痛苦与辛酸。

为了维系住最后的一点母爱,琳达撒了一个谎,企图把妈妈从乔治先生的手中夺回来。她并没有想到这会给燕心造成多么大的损害。孩子毕竟是孩子,李兹太太与燕心的关系却因此而迅速破裂了。如果说,燕心的离去是孩子造下的孽,那么还不如说,燕心的离去恰恰是她对琳达和李兹太太的认识或者说对美国家庭、美国社会的认识有了升华。

燕心的离去是必然的。但她又将在另一处寻求对这种文明的认同,这是燕心的处境,也是绝大多数华人留学生的处境。《小琳达》编织了一个不同文化、不同个性交错起来的网络,由此展示了生活于其中的华人留学生的心态。我们不知道燕心就读于哪所学校、哪个专业,但我们能明显感受到她那颗隐隐作痛而又依旧不甘失望的心。